

的表述具有创新性。在表述明清时期中国外事活动状态时，学界一般使用的词语是“闭关锁国”“封闭半封闭”。但在主权不属于腐朽性质时，对政府对外来入侵采取的自卫和对抗性的闭关，不宜用“闭关锁国”或“封闭半封闭”来表述，使用“自主限关”来表述比较得当。^① 这涉及对待民族主体性的态度问题。

其二，在19世纪时，欧美学者曾著文证实，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为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典范，欧美文官制度系从中国借鉴而来。科举考试中的“平等考试”环节，堵塞了封建官僚霸占官场权力的渠道，具有历史进步意义。^② 尽管中国的科举制度于1905年被彻底废除，但这种换位思考的研究具有“文明互鉴”的积极意义。

上述例子说明跨学科、跨国界的文化文明研究极有价值、值得重视。

新时代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前瞻^{*}

吴学琴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自2008年正式设立以来，始终以“史论结合”为方法论特色，以论证“四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为核心使命。新时代以来，学界围绕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的主体性和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概念与方法路径等关键领域展开了积极探索，取得明显进展，为学科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① 参见朱昌荣：《新时代清史研究刍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年第1期，第78页。

② 参见李丽萍：《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与科举制对其影响的进程》，《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104~105页。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人才项目“21世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话语创新研究”（22VRC094）、安徽省高校创新团队项目（2022AH010008）的阶段性成果。

一、在确立学科主体性中奠定知识体系构建的前提

新时代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知识体系构建的首要任务，是在厘清学科边界、确立学科主体和创新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实现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为知识体系构建奠定坚实的学科基础。

（一）厘清学科边界，确立双重属性

学科定位既是学科建设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围绕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边界与属性问题，通过辨析其与“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相关学科的关系，学界明确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与功能定位。^①在认识论层面，逐步确立了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根本属性与历史学特性相统一的双重属性：该学科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全面支撑，又有历史学的学科特点，必须在详细分析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对基本问题进行宏观把握，力求历史性与理论性的统一。^②这一理论共识为夯实知识体系的根基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

（二）确立中国视角，破除西方范式

确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的主体性，必然要求对长期影响

① 参见李松林、韦磊：《“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研究报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年第4期，第39~50页；纪宁：《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学科属性分析》，《鄂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41~42页；李翔：《新世纪以来学科调适与党史研究的新动向》，《党史研究与教学》2020年第3期，第21~26页；何志明：《明确归属和淡化边界——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再出发”刍议》，《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1期，第37~42页；宋俭：《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建设需要特别关注的几个问题》，《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第30~32页；宋学勤、宋效莹：《中共党史党建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关系析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第48~56页。

② 参见张静、解庆宾、王俊桥：《“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的再思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1期，第104~109页；师吉金：《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的思考》，《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07~111页。

中国学术研究的西方范式进行自觉反思与批判性超越。西方中心主义范式以西方现代化道路为参照系，将中国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经验的“变种”或“例外”，在解读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时往往存在价值预设与方法论偏差，其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格格不入。^①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破除西方范式，核心在于必须从中国发展的实际出发开展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史料之上，从根本上确立中国主体地位。^② 这一过程彰显了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开始走向自主建构的学术自觉，为夯实知识体系的根基提供了重要价值支撑。

（三）创新研究方法，拓展史料来源

一是以“大历史观”贯通古今中外。“大历史观”要求将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中，运用“古今中外法”加以考察：既将研究视野向前延伸，衔接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关注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在近现代历史中的延续与转化，又将研究视野向后贯通，联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同时引入全球史视野，把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放到世界范围内进行考察，在宏观比较中彰显中国近现代史演进的独特内涵。^③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大历史观”的深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不仅重塑了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道路的阐释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有力冲击、颠覆或破解了诸种来自外部尤其是西方学者的“宰制”式阐释

① 参见王晓文：《警惕现代化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143~148页；韩军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与思考》，《江汉论坛》2021年第7期，第114~122页；王宪明：《新时代中国近现代史“三大体系”建设的初步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2期，第16~26页。

② 参见王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沿阵地——兼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理论与改革》2015年第1期，第20~22页；冯兵、关浩淳：《史学研究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及其批判》，《史学集刊》2019年第6期，第25~32页；刘大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刍议》，《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4期，第15~24页。

③ 参见王炳林：《以正确党史观阐释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1~10页；陈锡喜：《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主题和“两个创造”的历史观审视》，《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5~12页；陈峰：《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学术传统的创生与衍变》，《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第104~111页。

范式，为树立多元主体中心论的研究范式作出了重大贡献。^①“大历史观”的引入，突破了狭隘的学科边界和时空局限，能够在宏阔的历史视野中把握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连续性与独特性，为夯实知识体系的根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撑。

二是学界积极拓展史料来源、更新研究范式、借鉴多学科方法，推动了研究方法论的深刻变革。史料基础呈现从单一向多元、从国内向国际的拓展趋势，对地方文献、民间文献、口述史料的整理与运用，澄清了过去在诸多历史事件上存在的误解；对国外史料的发掘与运用，使研究者能够从“他者”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②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史料数字化与数据库建设成为新时代史料基础发展的核心趋势。^③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还运用逻辑方法、比较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口述史学方法、社会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文化史学方法等，同时大胆吸收和借鉴其他社会科

① 参见韩庆祥：《全面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0期，第93~105页；冯莉：《“两个结合”与中国近现代史的阐释》，《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第67~73页；韩喜平、杨羽川：《“两个结合”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基》，《理论视野》2023年第9期，第39~44页；高继文：《“两个结合”重要论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化认识》，《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第4~13页；张城：《“两个结合”的理论特质与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学习与探索》2025年第7期，第22~30页。

② 参见仝华：《研读党的文献，坚实学科建设根基——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5年第1期，第126~136页；宋进：《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的他者书写述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6年第2期，第141~148页；吴永明、戴利朝：《民间史料与苏区史研究》，《苏区研究》2017年第5期，第38~45页；张牧云、沈珊珊：《国际共运史视野下深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的探索》，《思想教育研究》2021年第12期，第106~110页；邹晓菱：《中央苏区红色标语的历史价值及其当代传承》，《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12期，第77~86页。

③ 参见周兵：《历史学与新媒体：数字史学刍议》，《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第63~67页；陈爽：《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第14~17页；张晓校、杨梦宇：《数字化史料的构成及其价值意义》，《北方论丛》2021年第5期，第31~42页；李小旭：《数字人文视角下我国近代史料的挖掘与开发利用研究》，《山西档案》2024年第4期，第109~111页；刘畅、周怡晴、张燧明：《智识重构：AI驱动下的数字人文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新范式》，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1930609，2025年11月11日。

学方法。^① 这些新变化不仅推动了学科研究水平的提升，而且为确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知识体系的主体性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支撑。

二、在回应时代课题中确立知识体系的核心问题

新时代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知识体系构建遵循唯物史观，聚焦主题主线，顺应历史发展，发现历史逻辑和历史规律，在回应时代重大课题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叙事，实现了从理论自觉到实践引领的跨越，强调人民主体性和历史连续性，以及从“精英决策”向“群众实践”的转变，阐释中华文明如何在危机中自我更新、走向复兴。

（一）锚定时代主题，聚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

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论题，首先体现在对学科主题与主线的重新聚焦与深化认识上。学界在总结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与主线明确聚焦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研究范式的时代性转换。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与学理依据：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看，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和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从历史任务的统一性看，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从历史认识的深刻性看，“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概括宏观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接续奋斗的成就，准确而形象地描绘了百余年历史的最重要特征。此三者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一脉相承、递进发展的有机整体和清晰的宏观认知。^② 与

^① 参见张静、解庆宾、王俊桥：《“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的再思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1期，第104~109页；刘大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刍议》，《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4期，第15~24页；段治文等：《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② 参见郑师渠：《近代的文化危机、文化重建与民族复兴》，《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26~32页；徐瑞仙、丁志刚、陈一军：《从富强到文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省思与逻辑进路》，《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29~33页；欧阳恩良、肖玉元：《中国近现代史分期问题论争评析》，《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9期，第66~71页；方松华：《当代中国叙事：现代化、民族复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3~10页；李亚男：《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的构建、特征与价值》，《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16~23页。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相呼应，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主线，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脱离民族命运、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而独立展开的线性过程，而是在民族危机背景下、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开辟出来的历史道路。^① 这一聚焦不仅实现了对中国近现代史主题主线认识的深化与突破，而且使学科在回应时代课题中构建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核心内容框架，为整个知识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主题基础。

（二）顺应历史发展，凸显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

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精神的凸显，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回应时代课题、深化理论认知的重要维度。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基础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规律与主体能动性相统一的辩证思想，其历史观和方法论基础是唯物史观。^② 历史主动精神由历史自觉、历史使命、历史创造、历史自信等多元要素相互作用、融合生成，是知、情、意、行有机统一的精神品格，表现为尊重历史规律的科学精神、尊重人民的主体精神、清醒自觉的主动精神、未雨绸缪的预见精神、勇毅前行的担当精神。^③ 历史主动精神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开辟新境界、迈向新高度的深层动力，凭借这种历史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④ 这些成果不仅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

-
- ① 参见马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演进及前瞻》，《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第21~29页；宋学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历史逻辑》，《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24期，第82~89页；陆晓娇、杨学功：《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生成、本质规定、世界意义》，《江淮论坛》2023年第4期，第5~15页；姚宏志：《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建设》2023年第5期，第1~10页；陈金龙：《中国式现代化演进的历史逻辑》，《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9期，第12~19页。
- ② 参见池忠军、王志刚：《共产党人历史主动精神的唯物史观逻辑》，《思想理论战线》2022年第3期，第28~34页；薛俊清、王硕岩：《唯物史观视域下历史主动精神的生成逻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10期，第52~60页。
- ③ 参见骆郁廷、付玉璋：《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三重内涵》，《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9期，第80~89页；侯衍社：《历史主动精神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4期，第21~31页；刘良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精神：概念本源、构成要素与核心内涵》，《大连干部学刊》2025年第3期，第52~58页。
- ④ 参见王岩：《在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中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7期，第4~11页；沈壮海、黄雄义：《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的新开显》，《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第14~18页。

精神的理论认识,而且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知识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三) 明晰历史逻辑,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系统论证构成了回应时代课题的核心内容。学界立足历史发展脉络、理论创新逻辑、实践发展成效等多重维度,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逻辑必然,是历史和人民在长期探索中做出的正确选择,是中国历史上独特发展道路的逻辑延续。^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应对现实挑战与时代课题的必然选择,遵循了生产力发展规律、总体性辩证规律与历史性生成规律,证明了其应对现实挑战的实践有效性。^③ 这些研究既体现了对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彰显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学术自觉,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知识体系的核心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制度理论支撑。

① 参见龚培河、姜悠悠:《历史必然性的实现方式与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5期,第17~21页;姜淑兰、张丽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必然性与主动选择性的统一》,《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第1期,第66~71页;董振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必然》,《人民论坛》2018年第32期,第32~33页;朱国栋:《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铁的必然性”》,《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2期,第133~138页。

② 参见张雷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2期,第42~49页;荣长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科学社会主义》2014年第4期,第8~9页;荆世群:《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38~45页;姜义华:《天下为公、天下为家、天下为私:三大能极结构性纠缠历史逻辑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史哲》2022年第6期,第56~66页。

③ 参见顾海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9期,第18~20页;宋俭、叶丹:《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3期,第52~61页;张宏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的历史逻辑》,《党的文献》2021年第5期,第9~15页。

三、在提炼标识性概念中夯实知识体系根基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知识体系的构建，归根结底体现为从中国历史实践出发，提炼出具有原创性、解释力和影响力的标识性概念，形成能够准确表达中国经验、中国智慧的本土话语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升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能力。

（一）提炼标识性概念，夯实话语体系根基

概念是理论的基石，标识性概念不仅是对一定时期历史实践的深度概括，而且是一个民族理论思维达到原创性高度的集中体现。新时代以来，学界立足中国近现代史的实际进程，从历史主题、发展道路、主体精神、理论创新、文明形态等维度，提炼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了贯穿中国近现代史始终的核心主题；“中华民族共同体”为理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新视角；^①“中国式现代化”为理解中国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框架；^②“历史主动精神”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品格；

① 参见李贲、金炳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政治结构解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5~11页；杨刚、李若青、余文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建构：一个历史视角》，《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5期，第8~15页；邹诗鹏：《从国家民族及其认同建构看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建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25~34页；严庆、王跃：《历史政治学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探索》2022年第5期，第79~95页；陈浩、张榕：《自在、自觉与自为——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建设的内在逻辑》，《学术探索》2024年第2期，第83~89页。

② 参见王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创新的基本原则与实践探索——以“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为例》，《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12期，第53~56页；韩喜平、杜都：《在破解社会主要矛盾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第51~61页；项久雨：《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叙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2期，第15~24页；任志锋：《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叙事》，《广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第40~48页；严文波、沈卓群：《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历史维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10期，第30~39页。

“人类文明新形态”则从文明高度阐释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① 这些概念的提炼不仅深化了对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规律的理论认识,也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范畴基础。

(二) 培育本土话语体系, 强化学科表达特质

本土话语的生成既是标识性概念的系统表达,也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环节。新时代以来,学界自觉推动本土话语的生成与创新,形成了以中国实践为基础、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以中国表达为特征的学术话语体系。立足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实践,从史料发掘与历史阐释中提炼原创性话语资源,“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等一系列根植于中国实践的核心话语,不仅准确概括了中国近现代史的本质特征,而且为理解中国发展道路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概念工具。^② 围绕历史主题、历史主线、历史分期、历史评价等基础性问题,构建起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话语框架、以“党的领导”“人民主体”“独立自主”“守正创新”等为核心范畴,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气息的话语风格,使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不再仅仅是西方理论的“案例注脚”,而是成为能够独立提

① 参见陆云:《中国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76~82页;孙代尧:《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16~24页;田鹏颖、武雯婧:《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科学社会主义》2021年第6期,第74~80页;陈卫平:《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思考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近代以来的探索历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17~23页。

② 参见王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创新的基本原则与实践探索——以“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为例》,《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12期,第53~56页;赵亦彭:《浅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视阈下的历史话语体系构建》,《社会科学论坛》2018年第3期,第168~174页;吴学琴、武豹:《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建构的多维阐释》,《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4期,第15~25页;黄红发、俞思念:《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第100~109页;刘同舫:《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理与路》,《思想理论教育》2026年第2期,第4~11页。

出命题、建构范式、贡献思想的学术领域。^①这种本土话语的生成，使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知识体系具有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

（三）提升国际对话能力，传播中国历史叙事

国际对话能力的提升既是标识性概念提炼与本土话语生成的必然延伸，也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标志。新时代以来，学界积极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在国际学术对话中发出了日益响亮的中国声音。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展开系统性阐释，着力揭示其在发展模式、治理方式、文明理念等方面的独特内涵与普遍意义，推动这一概念从本土实践走向普遍理论，使其成为国际学术界理解中国、对话中国的重要理论枢纽。^②围绕国家治理、文明复兴、人与自然关系、共同富裕等全球性议题，从中国近现代史的深厚积淀中提炼出具有普遍关怀的理论命题，正在逐步改变国际学术界长期由西方理论主导的问题设置与解释框架，推动形成多元文明平等对话的知识格局。^③这一系列研究不仅彰显了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知识体系的主体性，而且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参与全球对话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在守正创新中推动知识体系构建走向深化

当前，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知识体系构建面临若干亟待破解的核

-
- ① 参见李永进：《〈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3期，第47~54页；韩庆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兼论中国式现代化是如何成功创造和建构起来的》，《哲学研究》2023年第8期，第15~26页；杨建新、杨婷：《“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互构逻辑》，《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6年第1期，第19~28页。
- ② 参见贾建芳：《以问题为导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38~45页；卢国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研究》，《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6期，第55~60页；田鹏颖：《在解构“西方话语”中建构中国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6期，第138~145页；黄海、段泽孝：《中国道路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构建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15~21页。
- ③ 参见王晓晖：《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4期，第1~3页；李斌、胡海利：《论“中国智慧”及其话语体系》，《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3期，第53~62页。

心问题。一是概念体系“标识度”不足。虽然“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主动精神”“两个结合”等标识性概念已经确立，但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概念体系仍存在泛化、模糊化倾向，原创性、系统性与辨识度有待提升，学科界限不够清晰。二是“宏大叙事”与“微观实证”脱节。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兼具历史研究与理论阐释双重属性，但在实际研究中，宏观历史规律把握与微观史实考辨之间往往存在张力：宏观叙事多，学理阐释少，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转化不充分；而微观研究又易陷入琐碎问题，与整体历史逻辑疏离。三是跨学科融合深度不够。跨学科研究多停留在“交叉”层面，未能实现深度的理论互鉴与方法贯通。在借鉴社会科学方法时，存在“硬套概念”或“随意拉扯史料”的现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手段的运用也相对滞后。四是理论创新与自主建构能力有待提升。研究中政策解读多，原创理论少，对经典理论的时代化阐释不足，学术命题与学术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较弱，在国际学术对话中仍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制约学科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面向未来，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应在守正创新中推进知识体系构建。一是坚持“两个结合”，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从中国近现代史的深厚实践中提炼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核心概念，实现传统范畴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二是坚持“大历史观”，完善方法论。要将中国近现代史置于文明演进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宏阔视野中加以考察，着力打通“宏大叙事”与“微观实证”之间的壁垒，形成宏观把握与微观支撑双向互动的良性机制，全面提升历史解释的整体性与说服力。三是拥抱“技术赋能”，拓展研究深度。要主动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知识图谱等新技术手段拓展史料发掘的广度与精度，同时要警惕技术至上主义陷阱，坚持以问题导向统领技术应用，在技术赋能与传统治学方法的有机融合中探索研究新范式。四是增强国际对话，推动知识“走出去”。要主动设置国际学术议题，增强学术表达的共通性与可通约性，在保持主体性的同时尊重不同学术传统，鼓励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规则制定，实现从参与对话到引领对话的跨越。

（责任编辑：李润东）